

十年 異 越

◎ 刘炎平 解艾玲 [著]

I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子季吴越

I

解思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吴越(上、下册) / 刘炎平, 解艾玲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309 - 5966 - 4

I. ①千… II. ①刘… ②解…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吴国(? ~ 前 473) - 通俗读物 ②中国 - 古代史 - 越国(? ~ 前 306) - 通俗读物 IV. ①K225.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1038 号

千年吴越(上、下册)

出 版 人 胡振泰

选题策划 王轶冰

作 者 刘炎平 解艾玲

责任编辑 田 昕

装帧设计 郭亚非

插 图 冯 笛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www. tjeph. com. cn](http://www.tjeph.com.cn))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885 千字

印 张 54. 75

书 号 ISBN 978 - 7 - 5309 - 5966 - 4

定 价 120. 00 元(上、下册)

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
百二秦關終屬楚
三子城甲末兵
苦分人言不自臥
新嘗

己丑年夏霖書



自序

这部书是抄来的——抄自历代史籍的零星记载，诸子百家的驳杂论述，以及汉唐以来同类题材的文艺创作。

有道是抄一个人的叫剽窃，抄众家的称研究，品评名家乃学识，无中生有属创新。本书虽然诸毒俱全，却仍算得上一部以吴越史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我们也期望读者将它视为一部企图集众家之大成、彰一己之异声的尝试之作。

本书动笔抄作之前，“吴越热”已经席卷海峡两岸。以吴越历史为题材的各种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多如过江之鲫。这些作品争奇斗艳，各具特色。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过分着意“古为今用”，对两千多年前吴越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恣意阉割，凭空添加，使得史实本身黯然失色，唯作者与编者天马行空般编造故事的充沛想象力跃然纸上。

本人收集考证吴越历史资料二十余年，自信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面对众说纷纭的罗生门，忍不住想正本清源，把自己所研究所发现的历史事件的合理过程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展示给读者，以免后人被继续误导或无所适从。于是做了自己生平最不屑于做的一件事：凑热闹。

这个热闹凑得很认真，很严肃。动笔之前，我又对这段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了反复考证，将多年收集起来的所有以吴越史事为题材的作品重新研究清理了一遍，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完成初稿，又和妻子合力修改加工，最后才写成现在这个模样。

写完后曾一度打算将它封存盘内，看看眼前这波方兴未艾的“吴越热”能否沉淀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时笔者也就不必当众献丑了。但经不住几位“原始股”读者，尤其是多年老友冯竺的怂恿和鼓动，最后还是决定改变初衷，把它抖落出来亮相。



据我所知,关于我国历史上春秋时期吴越争锋的这一段历史,最初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出现在《春秋》、《左传》及《国语》等史籍经典之中的。

《春秋》以鲁史为主,简单记述了春秋列国包括吴越两国的重大史事。《国语》及《左传》则对这些重大事件和参与这些事件的各种人物的重要活动作了翔实生动的记录。较之《春秋》、《国语》和《左传》具有较强可读性,但它们还没有被列入文学范畴。

以文学形式形象地再现这段历史的,首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一书《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篇章中,对吴越两国恩怨始末及当时叱咤风云的登场人物,都作了生动传神的记述。《货殖列传》亦对范蠡、子贡的经商活动及范蠡之师计然的经济理论述之甚详,对范蠡父子艰苦创业情节记述也真切感人。

东汉人赵晔、袁康和吴平,在广泛搜集先秦古籍的基础上,掺入当时许多小说家怪诞离奇的传闻,先后写成《吴越春秋》(赵)和《越绝书》(袁、吴)两书,开了以小说形式反映吴越争锋史的先河。但两部作品都属于中国文学史上之早期小说,在叙事方式、情节编排、素材处理及人物塑造诸多方面都还颇原始,带有许多不成熟处,与后来的小说、戏剧等创作作品不可相提并论。

此后一千余年,涉及这一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连篇累牍,但以诗歌居多,至盛唐时期达到顶峰(唐朝所有重要诗人几乎都有以吴越史事为题材的诗作),而以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则相对较少,内容也没有《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生动丰富,如魏晋南北朝仅见干将莫邪及夫差小女(姬玉)的故事于志怪小说之中,唐代仅有说唱文学《伍子胥变文》,宋元仅有话本《吴越春秋连像评话》及《七国春秋平话》等。

这种状况,直到明代小说家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冯梦龙(明)改编、蔡元放(清)又加以修订的历史演义《东周列国志》及明代戏剧家梁辰鱼的传奇剧《浣纱记》问世,才有所改变。

《东周列国志》是在《列国志传》的基础上改编的。该书一百零八回中,有十七回是写楚、吴、越三国史事及恩怨始末的,十七回中有五回写吴越争锋。这部书综合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述,艺术地、形象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吴越争锋这一段曲折复杂、动人心魄的历史,使勾践、夫差、范蠡、文种、伍子胥、伯嚭等人物形象比较广泛地为人所知。但勾践夫人

的形象显得非常单薄,美女西施也仅以政治工具的特殊身分获得少许笔墨,这大约与当时的政治舞台仍然由男性主宰有关。而发生在吴越两国间的这段历史中许多引人入胜的内幕和细节,也被那些浮光掠影、挂一漏万的粗疏记载忽略了。

梁辰鱼的《浣纱记》(原名《吴越春秋》)一剧首次将吴越故事搬上舞台,让勾践夫妇以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突出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并让西施和范蠡这一对情人历经磨难之后破镜重圆,表现了善良的人们对这些遭遇不幸者的深切同情和美好祝愿。但对夫差和伯嚭的处理则显得简单、脸谱化,缺乏血肉之躯的复杂内涵,作者似乎把他们仅作为僵硬的道具处置。

此后差不多又沉寂了四五百年,直到上世纪30至40年代开始,吴越争锋的故事才重新被人们提起,出现了许多反映这历史题材的作品。比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

顾一樵(顾毓琇)的四幕话剧《西施》(1932年);

梅兰芳编演的京剧传统戏《西施》(1940年前后);

萧军的长篇小说《吴越春秋史话》(1955年写完,1980年出版);

曹禺、梅阡、于是之的五幕历史剧《胆剑篇》(1960~1961年);

谭峙军的五幕话剧《勾践复国》(1971年);

白桦的七场诗剧《吴王金钩越王剑》(1981年);

杨善群的纪传体小说《顶尖人物:勾践》(1994年);

3.李劫的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2002~2003年);

董云卿的长篇历史小说《西施》(分《浣纱之女》和《英雄之泪》两册,2003年)等。

另外,还有近年来名目繁多不计其数的话剧、电影、电视剧等。

“吴越热”被文艺界炒作哄抬得沸沸扬扬,盛况空前。

顾本《西施》、梅本《西施》、《胆剑篇》、《吴越春秋史话》和纪传体小说《顶尖人物:勾践》等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吴越双方属于诸侯割据性质的权力争夺、领土兼并的生死之争和以暴易暴、彼此讨伐的战争行为,主观地定性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个方面,将勾践为代表的越方界定为受害的、正义的一方,将夫差为代表的吴方界定为侵略的、非正义的一方。正义一方的群臣如范蠡和文种等,理所当然跟着勾践成为被颂扬对象,非正义一方的伯嚭、王孙雄



以及别的谋臣武将却因站错了队,而跟着夫差变成反面角色。只有伍子胥因为被非正义的当权者夫差所杀,变成了烈士,侥幸躲过被全盘否定的命运,但明珠暗投,所遇非人,也难免被作者们有意无意地涂抹了一层愚忠色彩。

白桦的《吴王金钩越王剑》据说是受了李白《越台怀古》诗的启迪(见该剧单行本自序。按:此诗题有误,查李白诗选或《全唐诗》,其题应是《越中览古》),似乎要跳出这一窠臼,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将勾践塑造成为一个精于权术、反复无常、忘恩负义、冷酷无情的恶魔形象,全盘否定。这种大开大阖、极左极右的做法,使人强烈感到作者过于“情绪化失真”,怀疑他笔下的人物是否符合历史真实。

李劫的《吴越春秋》,更是属于翻案之作。作者认为夫差“健康”而勾践“变态”,英雄伍子胥走火入魔而“小人”伯嚭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正常人”(见刘再复介绍文章《一部人性化的历史小说——读《吴越春秋》》,载《世界日报》小说开头),显示他为翻历史旧案,已经彻底放弃历史尺度,矫枉心切却失之过“正”,“情绪化失真”倾向尤其严重。而该书着力渲染“人性”心理描写及作者议论过多,给人以借题发挥之嫌。

董云卿的《西施:浣纱之女/英雄之泪》独辟蹊径,以西施和范蠡的爱情生活为主线,穿插了吴越两国争锋过程,对勾践的肯定中含有淡淡的嘲讽,对夫差的失败则时时动恻隐,其立意和布局都有新颖之处。但受题材本身限制,故事情节单线发展,使读者难得领略到当时两国间剑拔弩张、生死拼杀的争战气氛。而且,色情描写较多,降低了作品的格调和品位。

其实,吴越争锋,说到底,不过是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种)等一千楚国亡臣,借吴越两国做舞台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抱负,导致这两个国家演出一场又一场国土兼并、权力争夺的闹剧。争斗双方都有称霸诸侯荡平天下的勃勃野心,但最终也都因为实力有限而仅止于彼此吞噬。

吴越两国都有过侵略对方和被对方侵略的历史。因此,两国之间发生的所有战争都属弱肉强食、复仇报复和相互讨伐,带有明显的诸侯割据性质。即以致导致越国覆灭的夫椒之役而言,首先挑起战端的,就不是吴国而是越国。正因为越王勾践感受到吴国复仇威胁,企图先发制人,毕其功于一役,才被吴国打得大败,从吴国所辖太湖境内的夫椒山一直败退到越国境内的会稽山,最后举国向吴国降服。由此将越国视为受害者,甚至界定为正义一方,显然是对历史事实的曲解。

据《尚书》、《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论衡》等文献记载,夏商之际,封国上万,至周朝时诸侯立国尚有一千七百九十三个,连同边远荒蛮少数民族部落在内,“尽于三千”。周朝初立时周公自己便立国七十一个,其中“姬姓者五十三人”,而“无人议其私偏”。夏、商、周三代两千年来,基本上是在诸侯列国之间弱肉强食、领土兼并的动乱之中度过的。两千年中战事频仍,大国兼并小国成风。据有人统计,仅齐晋秦楚四个大国,就先后灭掉了九十二个国家,光楚国就灭掉四十二国。连处于弱国地位的鲁、宋两国,也分别灭掉九国和六国;“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吴越两国亦发生多次篡权夺位、弑君自立的恶性事变,最后只剩楚、吴、齐、晋四家争锋。

由此可知,当时之所谓“国”者,其实不过是诸侯封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概念大不相同。吴越争锋二十年,也不过是两千年乱世波涛中一簇引人注目的浪花而已。故孟子有“春秋无义战”之说,后人亦有“春秋世乱,视弑君不啻割鸡”之叹(见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所以,只就某一战事的攻防胜负确定其是否“正义”,并由此判断当事人的是非功过,势必陷入形而上的唯心主义泥淖,进而对读者形成误导。

对西施、范蠡、夫差这一“三角关系”的精心安排,几乎在所有作品中都是一大亮点,浓墨重彩,引人注目。

《浣纱记》写范蠡动员西施赴吴,在吴国备受夫差宠爱。但她坚守自己越国人出身,“连穿衣吃饭尚不改习性”。越胜吴亡后她以“大国已配之夫人身份”返回越国,被勾践“还”给范蠡结为夫妇。范蠡辞官携同西施泛舟五湖,过着神仙眷侣般的幸福生活。

顾本《西施》写西施出于爱国心和责任心的驱使,不听从小青梅竹马的“好哥哥”范蠡劝阻,主动请缨赴吴寻仇,换回了被夫差先后拘禁的勾践和范蠡,又施展手段怂恿夫差杀死伍子胥。但后来又为夫差的一片真情所感动,在夫差与范蠡挺剑格斗受伤身亡后伤心欲绝,抽出夫差手中宝剑自杀殉身。

梅本《西施》取材于《浣纱记》及《东周列国志》,但在情节上又略加改动,写越王勾践和范蠡被俘入吴后,范蠡用计脱身回国,访得美女西施献与吴王夫差,换回勾践。越国灭吴之后西施荣归故土,受到勾践君臣隆重欢迎,然后由勾践赐婚让西施与范蠡结为夫妇,范蠡带曾经贵为“大国夫人”的西施夜半出走,泛



舟五湖不知去向。

《胆剑篇》中所叙西施的经历略有不同。她开始出场的身份只不过是“闪闪逼人的刀锋面前”挺身保护一个受害小女孩的“西村施姑娘”，被吴兵抓获到吴国三年后变成了美艳惊人的“王妃殿下”，她不仅多次派身边宫女为勾践夫妇提供各种“可靠消息”，而且在关键时刻“堂堂皇皇”来到石室，将冒死从夫差处盗得的“验关金符”送给他们要他们“逃走”。只是因为范蠡冷静分析形势，认为逃走根本不可能，才未形成事实。吴亡后对她的下落没有交代。

《勾践复国》中让范蠡以选美方式，亲到苕罗山下，若耶溪边，用爱国热情动员西施和郑旦“以越国女儿的清白之身去侍候敌人”，又答应来日国家倘使复兴，“范蠡情愿抛弃一切荣华富贵，和姑娘泛舟游于湖滨之上，以度此劫后余生”，再加上西施之父从旁鼓励，说得西施郑旦毅然去吴，且和勾践君臣密切配合，终于导致夫差败亡。最后以范蠡当众宣布西施“清白”，他“仍和十三年前一样衷心敬爱西施”，两人含情脉脉地约定“回头见”作结。

《吴王金钩越王剑》中让范蠡以亡国之恨激发西施的爱国热情舍身赴吴，在吴亡时高呼着“我要让你惨叫着死”，用金戈“刺透了吴王的心脏”。最后被范蠡从吴国王宫内一扇“可以转动的半圆形的柱状门”内接出，携手共同走向“茫茫水天之间的一线光明”。

《吴越春秋史话》中写西施和郑旦两个美女与孪生兄弟田和田平有婚姻之约，范蠡答应她们在吴亡之后与田氏兄弟相聚，动员她们“含悲去吴”，结果郑旦在吴国因病而亡，西施在吴亡后被勾践接回越国。范蠡为实践自己的诺言，私下帮助西施与田和逃往楚国，他自己后来也回了楚国。而勾践因“并非太关心女色”，“事后也没有多加追究”。（顺便说一句：历史上田和真有其人，是战国初期代姜齐而起的田齐第二任国君和子，前404年至前385年在位，主政二十年。）

《顶尖人物：勾践》基本因袭历来的传说，叙述的是越王勾践在濒临灭亡的处境下反败为胜覆吴雪耻的“传奇故事”，歌颂西施范蠡间坚贞不渝的纯真爱情，“实际上是一部曲折动人、波澜壮阔的越国兴亡史”（见该书内容提要）。结构、文字都迥异于创作小说，缺乏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由作者概念化地直接定性，将其列入纪传文学也许更为恰当。

李劫的《吴越春秋》曾于2002到2003年在北美《世界日报》上连载过，其中对西施与范蠡和夫差的爱情生活（包括性生活）有细致的描写和对比。西施

平
季
吳
大
世

在吴宫和夫差、郑旦饮酒作乐，同浴共泳，欢愉无限，且并肩与王后、伍子胥等多番较量，而范蠡则经常利用轻功在晚间“飞”到吴宫附近的树上苦思冥想。因《世界日报》只连载了它的上部，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董云卿的《西施》两册，将西施和范蠡、夫差之间的爱情生活，都写得细致、深沉、真挚感人。结局写西施和范蠡相聚，却又忘情不了夫差，使范蠡这位“战场上的英雄，情场上的败将”，不得不和西施过着有情无性的别扭生活。他还陪西施去夫差的坟前祭酒烧香。这大概是所有描写西施范蠡爱情生活的作品中，最独出心裁的一种设计了。

一路读来，感慨万千，只觉得这两男一女仿佛可以随意塑造的变形金刚，被那些才华横溢的作者们恣意差遣，上演一幕幕曲折离奇、变化多端的悲喜剧。剧终幕落，不要说台下观众不知他们所从何来，只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身为阿谁了。

需要指出的是：写于上世纪30至80年代的顾本《西施》、梅本《西施》、《胆剑篇》、《勾践复国》等作品，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作品中都充满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中“抗敌”、“复国”、“雪耻”、“中兴”、“发愤图强”等口号，与当时人们熟知的政治口号如出一辙。《胆剑篇》的作者之一于是之在二十多年后坦承，他们当时想的勾践、夫差，都是“实有所指的”，“想得太实了”（见《曹禺评传》）。很清楚，这里的两个“实”字，都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现实的需要。就是说，作者们是为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现实和创作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历史进行修改、“整容”的。

白桦的《吴王金钩越王剑》虽没有像《胆剑篇》和《勾践复国》那样旗帜鲜明，但也打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文革”后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想痕迹。对勾践“为王劣根性”的揭露批判，已经超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所能容纳的范围。萧军的《吴越春秋史话》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但该书的“产程”十分漫长：1957年成书，1962年被出版社礼貌退稿，1980年7月才艰难问世（见该书“前记”和“后记”），从中也可以隐约看到受现实政治影响的痕迹（作者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当然，作者在书中罗列史实过多过繁，叙述故事缺乏层次，人物形象也有概念化倾向，也使它难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相形之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问世的几部作品，就基本上摆脱了“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枷锁，作者们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可惜多数作者过分利用这种

千
年
吳
越

自
序

007



自由,为翻历史旧案而将历史人物剥离历史,塑造出众多不今不古、不伦不类的畸型形象。有的作品,还把西方警匪片中的惊险情节搬进中国王宫,安排那些以争风吃醋为能事的王后嫔妃们依样画葫芦钩心斗角。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们已经不是在再现历史或历史人物,而是在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并且创造的不光是中国历史。历史在他们眼里,已经变为一道可以随意摆设的虚拟布景,或一抹可以率性涂抹的斑斓色彩。他们比 90 年代以前那些对历史进行“加工”、“整容”的作者们走得更加不着边际。

当然,就创作谈创作,这种做法并无不妥。历史小说毕竟与历史教科书有所不同。在这里,古为今用,各取所需,甚至张冠李戴,移植嫁接,都是允许的。作者们对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抱持不同的看法,做出不同的评价,也属正常。但在现实功利目的驱动下,将几千年前的历史人物超度到现代来服役,让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活动范围完全超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这就不是诠释历史,而是在从事“荒诞创作”了。它和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至于近年来蜂拥上市的电影、电视剧以及这样那样的“戏说”之类,因基本上都是功利挂帅,把追求收视率列为首要目标,只要能引起“轰动”即被制作者视为成功。“轰动”过后,便是不可避免地销声匿迹,有的连名字都不易寻找。若想对它们做出贴切的艺术评价,就困难了。

我对吴越争锋这一段历史的兴趣,是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便开始的。当时主要受了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话剧剧本《胆剑篇》的影响。

后来看到《东周列国志》、《国语》、《左传》及《史记》等历史典籍,发现越王勾践并不是像《胆剑篇》所歌颂的是一位令人敬佩的英雄,吴王夫差也并非一条浑浑噩噩荒淫误国的混虫。他们的胜败,除个人性格和个人才能之外,还有种种复杂的客观历史因素,不是简单的谁好谁坏、谁正谁邪的问题。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资料,对比研究,想要在这一方面作出自己的结论。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发现线装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残本,如获至宝。因图书馆为保护珍贵古籍不准借出更不准复印,故不得不在图书馆内将它逐字逐句抄录下来,花了整整两个多星期才全部抄完。十年后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发现一册《野史汇编》,《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在其中,喜出望外,立刻花钱复印了一份珍藏起来,算是了却了一

桩为时十年的耿耿心愿。

在漫长的搜集求证过程中，我对吴越争锋这段历史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看法，却不知道该如何系统、完整地予以表达。一段时间，曾想再做二道贩子，把搜集到的所有资料汇总编辑成一部《吴越全书》，顺便写一部《吴越史》续貂尾。我在这方面有过前科，曾经编写出版过《中国古典名剧故事》和汤显祖戏曲故事集“临川四梦”。但是想到把堆积如山的资料编辑成书的庞大工程，以及此书编成之后的出路和前景，最后还是知难而退了。无奈，只好收拾妆奁再做冯妇，抱起臧晋叔的《元曲选》、毛晋的《六十种曲》及几部清代近代戏曲大全，埋头编写《元明清三代名剧故事》以消磨时日。编到明代梁辰鱼写的《浣纱记》，才蓦地动了写小说的念头。

在《浣纱记》(原名《吴越春秋》)中，梁辰鱼将发生在离我们将近两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段记载简略的历史，写得凄婉动人，有声有色，范蠡、西施、夫差、勾践，还有在许多史籍中只有其名的勾践夫人，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面前(本书中关于勾践夫人对西施施训的情节，就是受此剧启发写出来的)。在把它改写成一篇“故事”的同时，我情不自禁地为它的情节单纯、内容单薄抱憾：这一段异彩纷呈、动人心魄的简短历史，若写成一部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厚重作品，该是多么打动人心啊！

从此，但凡与“吴越”二字有关的任何资料，无论是史籍、小说、戏剧、电影，或者报刊、网上有关短文，我都请妻儿帮我一道收集起来，再在他们帮助下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再集装成箱，编号堆积，不遗余力地为写一部“作品”做准备。积习成癖，十几年之中，收集的文献资料几近汗牛充栋。它们随着我们全家在北美大地迁徙转移，每次搬家都成为一大赘事。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和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是我们搜集有关资料的两大宝库。李劫在北美《世界日报》上连载过的《吴越春秋》(上卷)，是来自台湾的黄清泉先生夫妇二人逐日剪贴，从加拿大为我寄到美国来的(一共357天，一天都不缺！)。董云卿的《西施》两册及杨善群的《顶尖人物：勾践》，以及《诗经》、《易经》、《楚辞》等有关资料，是从芝加哥世界书局电话购得。《国语》、《左传》、《战国策》、《吴越春秋校注》及江苏浙江苏州绍兴文物地理志等，是甥儿张兵、甥女映霞及凤芹从国内多方搜求，越洋寄来。凤芹为我查找方便，还用她歪歪扭扭的字体辛苦抄写了一大册《春秋战国地名录》给我。《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光盘及《十三经》、《二十二子》、《诸子集成》等大型丛书，是儿子刘将回国探



亲时,或从网上为我购得。几套关于弹琴鼓箏的专业教材及历代名曲光盘,则是2006年春天举家前往新西兰度假旅游时,一对香港移民黎氏伉俪慷慨馈赠。他们同时为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从不同角度帮助我完成了《千年吴越》的写作。

本书基本上以《吴越春秋》、《越绝书》、《国语》、《左传》和《史记》中所提供的资料为基础,以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复仇争锋的经过为线索,大体采用写实手法,力图让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政治人物,如勾践、夫差、西施、范蠡、伍子胥、文种等,以生动鲜活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

写作中给各色相关人等都留有较为广阔的活动空间,让所有出场人物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自己的风采。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专门章节。主要人物如伍子胥和西施,还有他们自己的“专部”。为体现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每个人的故事都不是一气呵成,而是随历史事件流转时隐时现,读者在读完全书后才能窥见他们的全貌。此点在西施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书中所述许多看似鲜为人知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从诸多史籍资料的字里行间,甚至“字缝”里挖掘出来的。有的来自《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新旧《唐书》等史书,有的来自《论语》、《管子》、《老子》、《庄子》、《列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及《抱朴子》等专著,有的来自《汉魏六朝笔记小说》、《五朝小说大观》、《世说新语》、《战国策》、《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典籍。

为查证一项资料,论证一种观点,常常一口气在图书馆翻检几十甚至上百册书,披阅抄写,反复对照,去伪存真,寻求真相,连寥寥数字都不放过。这种“挖掘”,正如鲁迅所说“煤的形成”——“当初一大堆树木,形成煤却只有一小块”。很辛苦,但我却甘之如饴,乐在其中。

民歌、卜辞、军旅、经济、官制、武器、天文、地理、舆、服饰诸般知识,则从《诗经》、《易经》、《尚书》、《武经七书》、中国古代经济、军事、兵器、官制、人口、疆域史志及王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等各种著作中撷取而来。《吴郡志》、《姑苏志》、《会稽志》及浙江江苏地理简志,是其中的重点参考资料。

“武圣演兵”、“范蠡论政”、“薛烛论剑”及伯嚭演兵肇祸等章节,体现笔者对《孙子兵法》、范蠡之师计然的天人合一说和经济理论、古代兵器发展史及兵家名阵“一字长蛇阵”阵法的研究与理解。这是参看了上百种专著才产生的结

论和联想,其中包括《武经七书》、《孙子》诸家注、《史记·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食货志》、《管子》、《韩非子》以及鬼谷子、姜尚、诸葛亮、刘伯温诸人的“神算兵法”,等等。

伍子胥、范蠡、文种诸人问易卜卦等情节,笔者翻阅了数不清的易学专著也弄不清所以然。唯一收获是发现“易经不易”,无法采用速食方式吸收消化。为不信口开河误人子弟计,只好原文照抄,留与精通此道者去揣摩研究。笔者庶几可免班门弄斧,贻笑大方。

将如许之多的知识编织入书,目的是为书中人物提供一个切实、广阔的活动空间,使他们的种种活动大体都有踪迹可寻。打开书本,读者能够较为感性看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加深对书中人物所处环境及性格形成过程的了解,而不是仅仅看到几串人名、几场战事或几则故事,面对一丛缺乏生气的绿豆芽。

全书由五部,一百零一章(最后一章是尾声)构成,写作过程中采取了如下三种手法:

一、故事倒叙。全书从越国复仇攻吴而不是从吴国伐越开始,然后从头叙说吴越仇隙,逐步交代人物。重要人物如夫差、勾践、伍子胥等,也多用倒叙或插叙方式讲述他们的出身、经历、主要故事。故事情节此起彼伏,前后贯穿许多章节,埋伏线,设悬念,环环相扣,步步深入,让读者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饶有兴趣地读完全书。

二、章节倒排。从第一〇〇章写到第〇〇一章。最后一章(尾声)编号〇〇〇,并非故弄玄虚,而是笔者阅史过程中的强烈感受。

三、人物重评。对读者所熟悉的全部人物,一律解除他们为现实服务的劳役枷锁,让每个人都以自己本来的面目回归历史坐标系,而将其功过、是非、性情、人品,留与读者去判断。笔者虽有自己的爱憎喜恶,却绝不以刀笔结讼,更无意强加于人。

事实上,书中人物都很难一语道尽他们的好坏:为君者不只有昏明之别,为臣者亦不仅具忠奸之辨;坦坦君子常藏难言之隐,戚戚小人时有可炫之德;尖酸刻薄者不乏忠厚之举,作恶多端者每陈悲悯之词。即使是坏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物,也都让他有机会表述自己“非为不可,不为不行”的堂皇理由。笔者绝不刻意美化圣人或丑化“贼坏”。



例如：

越王勾践。他既是能够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反败为胜且知人善用、从善如流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弄权有术、心狠手辣的“小人”。他的整个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阴谋二字。《吴越春秋》一书将他复国灭吴的过程，以《勾践阴谋外传》为题，可说抓住了勾践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他临终给自己儿子留下的遗言，表明他还有许多蓄谋已久的暴行没有实施。他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已经将越国的臣民百姓推到了几近扯旗造反的边缘，如果他不幸迟死几年，越国天下非得大乱不可。

吴王夫差。他在治政方面雄心勃勃，一心以荡平中原统一天下为己任，惜乎志大才疏、贤愚不辨、亲奸佞、诛忠良，已经属于十足昏君。但论其个人品格，则坦荡豪爽、聪明过人，且多才多艺、体恤下情，是受到万千臣民拥戴的“大王”。本书末尾给了他一个拥众自杀的悲壮结局，还把他写给西施的血书让坐骑黑龙驹替他公开，就是有意淡化昏君和明君之间的界限，启发读者对他做出全面、切实的评价，将社会角色扮演的成败和人物本身品质的优劣区分开来，而不是只用事业成败或品行优劣这一把尺子去量长短，定是非。

伍子胥。他是众所公认的忠臣、贤人，为谏吴王不惜肝脑涂地，然在帮助阖闾弑姬僚、刺庆忌以及伐楚复仇的过程之中，则显出他阴狠毒辣、冷酷无情的一面。他在伯嚭的花言巧语和阴谋诡计面前无力自保，让人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而对他的“贤”和“能”产生疑问。端木子贡对他的人品和谋略推崇备至，而范蠡则讽刺挖苦：“连一个伯嚭都对付不了，子胥之能，又在何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两极，各有千秋。

范蠡。他好谋善断，沉稳冷静，计多谋深，料事如神，在帮助勾践死里逃生、复国灭吴以至最后代吴称霸之中，功不可没。但他在对西施的感情上模棱两可不负责任，眼看文种屡做错事屡犯错误而听之任之，在灭吴复仇的大战中流露出对夫差强烈的个人仇恨，他聪明过人，令勾践永远对他放心不下……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他人格中深藏不露的另一面。他在越胜吴亡后毅然出走，充分体现了他的冷静、坚毅、机警、果断、高瞻远瞩和过人智慧，也使他和勾践之间被人津津乐道的君臣鱼水关系散发出浓厚的讽刺意味。

文种。他文武双全，才气过人，在帮助勾践制定落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重大国策及复国灭吴过程中，都表现出杰出才能。但在勾践面前暗中与范蠡争宠，在迎合勾践某些不可告人的欲求方面又出了许多为人所不齿的馊主意，显

得猥琐和低俗。直到最后被勾践赐死，方才幡然醒悟，但是已经噬脐难及。这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他的结局，十足显示出“伴君如伴虎”的臣子悲情。我在写他的过程中惋惜往往多于同情。

伯嚭。这是个典型的“反角儿”。他贪财、好色，受越国收买，善假辞令，心计多端。在内部政争中多次濒临绝境都能化险为夷，而与外敌交手却败绩连篇，被越国君臣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还促使夫差无可奈何地走向毁灭。说他蠢？他在宫廷论辩中口似悬河舌如利剑，议论纵横不可一世，对手总是德高望重雄辩滔滔的伍子胥，而且经常被夫差“判胜”。说他精？在越国君臣设就的圈套面前，他几乎每次都死心塌地地入彀就范，心甘情愿地让对手牵着鼻子走。但是在治政方略上，他也常提出这样那样的合理主张，对王孙雒等人的合理建言和主张也能大力支持，颇有几分政客风度。他与伍子胥“道不同不相为谋”，有分歧，有争执，是很自然的，不能因为他提出某些错误主张便把他定为坏人。如果不是他下山请降时卖身投越，恐怕为此公“定性”也是一大难题。

此外，几乎所有有关伍子胥的作品中，都写到渡伍子胥过江的老渔父和舍饭给伍子胥的浣纱女，为替伍子胥保守秘密而投水自杀，而后来又有老渔父之子出面救郑、浣纱女之母向伍子胥要钱的情节。这样写，既违背常理又与当时“左近无人”相矛盾。故而我让老渔父之子挑明他父亲当年在江心翻船自杀是假，让伍子胥放心走路是真（人生阅历丰富的老渔父说不定还担心被伍子胥杀人灭口呢！），让浣纱女只对伍子胥的“啰唆”发了一通脾气迫使伍子胥抱愧而去，也不再让她母亲哭求伍子胥报答。

这样处理，既清除了许多作品长久以来相因相袭的自相矛盾，又洗刷掉了历代封建文人强涂在浣纱女母女身上毫无必要的“贞节”意识和愚昧色彩。几个身为配角的“小人物”形象，也显得不那么干瘪僵化了。

类似同“传统意念”相悖的小纠小正，在书中别的地方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赘举。

书中有两个女性形象，我在描写她们时下了一定工夫。

第一位是勾践夫人。这是个几乎被历史湮灭了的人物，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典籍中，对她的记载都十分简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只有“夫人自织”四个字。

但她其实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复杂人物形象。